

“听话”的张朝阳“火”了

张朝阳本应在“听话、出活”的路径上继续前行,为什么在 2010 年刚刚开始,忽然话锋一转,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,甚至被人们冠以“说真话”的头衔?

2010 年伊始,沉寂很久的张朝阳忽然火起来,原因是他的一番讲话,被认为讲了真话。众人由此认为,张显然是个有常识的人。据说,他在演讲的时候,网络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,由此可见,张甚至是一个有勇气的人。

人们对张朝阳的溢美,并不过分,但问题的关键在于,在相当长一段时间,公众视线中的张,除了他那些刻意为之的个人形象,最明显的特征,就是言辞虚以委蛇。也就是说,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,张其实是一个善于说套话,甚至说假话的人。

“听话、出活”

熟悉清华的人都应该知道,这所著名的学府提倡的校园文化价值是厚德载物,但流行的乃是“听话、出活”这样的市井格言。张朝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,他的身上显然有着清华大学的集体意识。某种意义上,张就是一个典型的既听话,又出活的人。即使在麻省理工读了博士,这种品质依然是他最醒目的标志。

有人曾经分析过张的生态。今日中国内地互联网领域,新浪是流量最大的网络综合门户网站;网易的新闻门户意义稍微差一些,但它的信息服务在深度方面做得相当到位,网易第一次跨越了网络阅读的快餐文化,引领受众正在朝深度发展;百度的要点当然是中文搜索;腾讯有个可爱的 QQ,这个小小的即时聊天工具笼络了一大批未成熟和半成熟的年轻人;盛大靠游戏赚钱;阿里巴巴是电子商务;只有起步很早的搜狐到今天为止,似乎无法总结出一条真正有含金量的核心价值。

说实话,在新闻门户老大的位置被新浪夺走之后,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要想再次寻找到真正的核心价值,的确难上加难。在网易的短消息服务爆得大利之后,张朝阳曾经想开辟中国最大最优秀的彩信服务,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路径,不过却没有得到信息管理部门的眷顾,张朝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资金来推广,不料却栽在管理层的手上。

这个时候,张朝阳身上的品质拯救了他,他开始回到“听话”的位置上,认同体制,认同管理,张开始在他的话语体系里置放一套非常娴熟的主流话语。人们甚至看到张朝阳忽然成了抵制外国产品、抵制家乐福的呐喊者和组织者,虽然他的私人游艇可能还放在嘎纳的海边,虽然他的一身

派头都是外国叫得上号的知名品牌。

华丽转身

可以说,过去的这些年,张朝阳话语体系主流复主流,事实上与他的公司战略有关。公司的目的当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,任何形而上的空谈,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,都是危险的。

沿着这样的逻辑,张朝阳本应该在“听话、出活”的路径上继续前行,为什么在 2010 年刚刚开始,忽然话锋一转,成了自由经济的鼓吹者,甚至被人们冠以“说真话”的头衔了呢?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张朝阳,从此来了一个华丽转身,非常决绝地走上了意见领袖的道路呢?

的确,如果没有留意过张朝阳过去的言辞,今天他的表达简直就是哈耶克自由企业理论在中国的见证辞。

当然,作为一个新经济新技术的公司人,张朝阳更加重视创新,他认为,“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竞争,保护竞争也就是保护创新,我们目前只有民营企业才参与全方位竞争,而国有企业通常情况下,都在依靠垄断分享利益”。

张的话有道理,翻看人类科技史,真正能够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,都是个人劳动,或者说,都是由私人机构推动,而国有企

业向来热爱宏大叙事,他们不在乎技术的更新,不在乎人的发展。我相信张朝阳的这些陈述,都是肺腑之言。一名以赚钱为使命的企业家,没有必要在言论方面刻意求新。

问题是,张显然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轨迹,如果中国的全球产业分工位置持续走低,他所在的新经济领域,必定越来越萎缩,一个靠粗放型加工寻求发展的市场,显然不需要那么多新观念和新技术,中国的一批新经济企业有可能被导入到陈旧的企业制度模式之中。今天看起来锐气十足的互联网企业,他日极有可能重蹈国有企业产权模糊、人浮于事、发展乏力、腐败盛行的覆辙。

也就是说,即使仅仅从利益出发,张朝阳也不愿意这样的局面出现。现实的市场逻辑是,任何一家新经济企业,都是以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前提的,在这里,信息自由不再是一种泛政治口号,而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。

所以说,在这样的层面上看,今天的张朝阳的确说了真话,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真话。没有人能够超越“屁股决定脑袋”的魔咒,张朝阳也是如此。

张朝阳的真心话

●30 年的成就是巨大的,我们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,甚至处于飘飘然的状态,我们



现在津津乐道大国的崛起,兴奋地(如环球时报、参考消息等)收集着我们依然崇拜的高贵的西方人对我们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赞扬,仿佛中国,middle kingdom 作为世界中心被周边列国朝拜的辉煌秩序又恢复了似的。这是一种幻觉!西方人其实依然不怎么把我们当回事儿!

●矢志不渝地进行市场化改革,不改革没有出路!没有充分的,公平的市场竞争,就没有品质,没有优秀,没有就业机会,没有稳定,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。

●具体怎么做? 问题很复杂,但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,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,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,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,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,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,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、与民争利的举动,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。

(摘自《南都周刊》)

殡葬业暴利催生“墓奴”

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冢自生愁”,“荒冢”无人祭奠,怎不凄凉。现在殡葬制度早已改革,但欲购一堆葬骨灰的“冢”却绝非易事。近日《工人日报》报道,青岛一些市民在为故去亲人选择安葬地发愁,因为墓地价格犹如脱缰野马,一路上涨,不少人感慨:“生买不起房,死买不起墓!”有人说自己既是房奴又是墓奴。

墓地的地价成“天价”,早不是一时一地之事了。长春墓地每平方米均价过 2 万元,是房价 5 倍,这还不算高的。“阴宅”价格与涨幅都远远大过“阳宅”,这与殡葬业连续数次进入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列是相匹配的。

从民俗心理来说,中国人对于“死”看得特别重,为父母生前尽孝的“养生”与为父母死后安葬守孝的“丧死”,在孟子眼里分量是一样重的。也就是说,丧礼与安葬地是否“体面”,既事关死者生前是“泰山”还是“鸿毛”的尊严,更关乎子女是否尽孝的伦理道德考量。这,应该是天价墓地需求的主要成因。

所以,墓地推销人员说得最多也最有杀伤力的一句话是:“尽孝心别打折!”绝招一出,无人敢再砍价。本可以回他一句:“赚昧心钱别太过分!”但土地资源在人家手里,各墓园又形成了价格壁垒,得罪不起。

问题就出在墓地资源的垄断性经营上。长期以来,公墓管理与经营政企不分,民政部门一套人马,两块牌子,既是管理者,又是经营者,这种高度垄断又缺乏价格等方面的有效监管,在“刚性需求”无限的前提下,便必然造成富人死得起,穷人“死不起”的现象。

照理说来,丧葬服务具有社会公益性,让每一个公民“葬得有尊严”是等同于让每一个公民“活得有尊严”的。作为提供社会公共福利的机构,本不应该从公民的死亡中捞取暴利的。

现在有些地方开始出台一些政策,像北京即将投入首个市级公益性公墓,预计价格不高于每个 3000 元,被网友称为“经济适用墓”。如果“尽公益心”也能“不打折”,真正把殡葬业当成国家的公益事业,而每个公民的“尽孝”也着重体现在对长辈生前的关爱上,把墓葬的“体面”相对看淡一些,那么,“墓奴”词也就可以速朽了。

(摘自《钱江晚报》)

“小县城房价过万”之痛

如今,布局二三线城市,已经成为地产界新的趋势。二三线城市的房价正在快速上涨,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,例如苏南等地,小县城的房价已经过万。

面对高房价,城镇居民不堪重负,作为城市化主力的农民,也只能望房兴叹。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,农民从农村向城市的固定

性和永久性转移,将很难实现。“小县城房价过万”,会对城市化起到反作用,使中小城市失去原有的优势。

“小县城房价过万”,必将带来两个后果。一是阻碍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的发展。产业之所以向中小城市转移,新兴产业之所以选择在中小城市破土生长,很

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小城市的成本较低。但是,当“小县城房价过万”之后,中小县城将失去对其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本优势。

另一个后果是,“无根”市民增多,人口在城乡和区域之间持续剧烈流动,平时流出去,节假日探亲回来,年轻强壮的时候流出

去,老弱病残的时候流回来,中小县城的自身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将受到阻碍。

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民生不能承受之重。如果任“小县城房价过万”的现象发展,必将成为中国城市化不能承受之重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郭文婧/文)

“地沟油”应该找新出路

子铤而走险,也导致政府部门的监管失效。众所周知,“地沟油”的原料来自餐厨垃圾,不少城市因此对餐饮企业实行餐厨垃圾申报回收、定点处理制度。但这一制度缺乏激励机制,有时还要餐饮企业支付回收费用,导致餐饮企业积极性不高。有的企业图方便,将餐厨垃圾偷偷倒掉,有的甚至在“地沟油”回收者的利益诱使下,直接与他们形成合作关系。

既然“地沟油”有利可图,为何不能将其变成正大光明的利润,回报给合法回收的餐饮企业呢?在欧美等发达国家,废旧油脂已被广泛用于生物柴油开发,成为替代传统柴油的新能源,利润可观。德国、美国政府还出台各种

政策,鼓励消费者使用生物柴油,并给予生产企业相应补贴。再看国内,将“地沟油”提炼为生物柴油的技术早就起步,但不少掌握技术的企业由于收不到废油,只能将技术闲置。

在这种情况下,迫切需要政府部门对生物柴油这一新兴产业给予扶持,既让加工企业得益,也能鼓励餐饮企业。比如,“地沟油”加工企业在收集废油时,可能需要和“地沟油”回收者竞价,但中小型的科技企业受成本制约,未必有价格优势。对此,政府部门在必要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,让餐饮企业乐意参与定点回收,也帮助正规加工企业收到废油。同时,可借鉴国外经验,拓展

生物柴油的应用范围,加快生物柴油的市场化进程。例如,欧盟对生物柴油在欧洲汽车燃料中的销售比例作出硬性规定,美国能源部门要求公共部门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车辆使用生物柴油等。

不难预见,生物柴油的推广,意味着大批废弃油脂将有一个规范的下游流通渠道,形成一个从油脂收购、加工到新能源输出的新产业。而现有散乱的“地沟油”收购也将面对一个规模庞大的正规输出渠道,最终退出市场,实现“良币驱逐劣币”的目标,从根本上保证市民餐桌的原料安全。

(摘自《解放日报》任翀/文)

官员们为何爱到包厢“办公”

媒体报道,海南万宁市万城镇有个“包厢书记”。镇委书记林某长年在茶艺馆包厢办公,林某也承认自己很少回办公室,常去茶艺馆包厢是为了谈工作。于是,网上有了“包厢书记”。

其实,在海南久了,就明白爱上包厢“办公”的官员岂止林某一人。前几年海口整顿“老鸭汤”现象,就是说一些职能部门,办公明到了该盖章的时候了,却锁上抽屉,提议喝碗“老鸭汤”再说。当然,喝“老鸭汤”就得进包厢,进了包厢喝的也不一定就是海口物美价廉的“老鸭汤”。

官员们都有办公室,办公室里自然是办公事,其中有些官员的办公室还很豪华。但是,这些官员们还是很爱在包厢去办公事。那么,官员们为什么爱在包厢办公呢?

有人分析,因为办公室里的氛围不如包厢。现在的办公室,一般是一个宽大的写字台,写字台后面有一大班椅。官员坐在后面,办事的坐在前面,如此格局,形式上拉开了距离,内容上自然也拉

开了距离。这宛如法院,法官穿着法袍,坐在审判席上,高高在上,头上还有一国徽悬着,被告和其套近乎都难,还能表示感情么?但是,如果法官换上便装,走进包厢,推杯换盏,形式变了,内容自然也就可以变了。包厢只是形式,关键在于内容。

有人认为,因为包厢里的氛围很和谐。媒体经常报道,有公务员在办公室玩电脑游戏,有官员在办公室里打麻将,这些事情一经披露,立即引起公愤。为什么?环境不合适么!但是,如果换成包厢,这些事还能是事吗?进了包厢,上下级可以是兄弟,官员和商人也可以是兄弟,法官和原告或者被告也能成兄弟。成了兄弟,就有了感情,有了感情,两人关系的性质就变了。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,包厢是一个盛产朋友的地方。

有人怀疑,官员爱上包厢根本不是办公。包厢里只有茶杯酒杯,有时候要记个电话号码,还得找服务员拿张纸来,公章印泥,还有打印机复印机,官员眼下离不开的办公设备都没有。其实,这是



不理解官员的办公程序了。官员办公,真正办理的过程很简单,复杂的就是为什么办?我给你办了,你给我办什么?于是,官员们常常把这第一程序在包厢给办了,然后再回到办公室走程序。包厢是办公室的外延,办公室是包厢的继续。

有人提议,既然官员爱上包厢办公,干脆把办公室装修成包厢。其实,现在有的官员,办公室已经包厢化了。有的里面有星级酒店卧室,有的外面有高档茶艺馆的泡茶设备,仅仅是享受,官员们完全可以关起门来。但是,办公室所在的外围环境不可能改

变,其他同僚的眼睛不能蒙上。再好的办公室,也抵不上一般的茶楼酒馆的包厢。当然,贪官在办公室可以受贿,在包厢也可以受贿,可是,实践证明,包厢受贿的概率要比办公室高得多,何况在办公室受贿的大都有过包厢的铺垫。

办公室也罢,包厢也罢,都只是形式。从哲学角度来看,没有一定的形式,就没有相应的内容,但形式与内容之间,并没有固定的关系。假如“包厢书记”今后即使不到包厢了,如此执政理念,就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,你能相信他都是在办公事吗?

(摘自《人民网》矢弓/文)

民生难题玩“除法” 民众怎能无看法

温家宝总理曾经用“乘法”表述自己的执政感受:“一个很小的问题,乘以 13 亿,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;一个很大的总量,除以 13 亿,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。”很多时候,民生问题就是这样一道“简单而又复杂的乘法”。

“乘法”体现了总理对国情现实冷静的思考。然而,并不是每个行政职能部门都会学以这样的“乘法”来清醒思维。个别部更“反向思维”,对民生难题玩起了“摊薄”游戏。

“摊薄”,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以大分母去除难题。以下两组数据,都与生活中老百姓的真实感受相悖,恐怕就和做错了这道民生数学题脱不了干系。其一是,民政部发布了我国殡仪馆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调查结果,全国殡葬服务费用平均为 1045 元/具。其二是,年初国家统计局曾因公布 2009 年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涨幅 1.5%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。而近日,国土资源部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称,2009 年全国住宅平均价格为 4474 元/平方米,涨幅达 25.1%。两者相差 10 多倍。

曾有网民这样自述“蜗居”不易,“生不起,剖腹一刀五千几;读不起,选个学校三万起;住不起,两万多元一平米;娶不起,没房没车谁嫁你?病不起,药费利润十倍起;死不起,火化下葬一万几。”看似戏谑调侃的语气,却真实地道出了“夹心层”生活的艰辛。而上述两则新闻中的数据之所以难以得到百姓的认同,根源正在于,这些数据与大多数民众身边的生活感受相差太远,甚至违背了常识。

近年来,一些统计数据屡屡遭到百姓的质疑,“被就业”“被增长”“被富裕”等“被”字语系的层出不穷正缘于此。这些数据未见得就是弄虚作假,也不能排除广大欠发达地区的房价、殡葬费等仍处于较低的水平,如果教条地都拿来算平均数的话,很可能拉低统计数据,使其达到“看上去不难看”的效果。

民生难题玩“除法”,民众怎能无看法。想让人民“没看法”,一是有关部门尽快从制度上改进统计方法,提高统计数据公信力。更重要的是,有关职能部门得先补上民生“乘法”这堂课,迎难而上,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多功夫,而非“反向思维”,通过在表面数据上做文章,使问题“消失”在繁复的统计方式中。

玩“除法”摊薄民生难题,无益于正视民生疾苦,更无益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民生解困,只会把民心“除”得越来越寒。(摘自《华夏经纬网》刘晶瑶/文)

“喇叭门”让考场弊案登顶

考试交卷前对答案,这等好事谁不想?日前,在吉林省招录公务员考试的通化市九中考场,当考试进行到大半时间,考场的广播中不断传出一个女声念数字和题号的声音,监考老师和考生都很诧异。后来,有考生发现,播的是考试答案。

科场作弊,古已有之:代考、射箭求助、微型书、衣衫藏字等等,然比之今人,实乃小巫见大巫。此事有关部门正调查,尚不清楚信号来自何处。有编外福尔摩斯推测:一、考场广播室有人与考生联手作弊,“扩音器”看不过眼,愤而揭黑。二、有人借高科技作弊,不料信号被考场监听设备捕获,而监听设备又无意间联上了扩音器,于是天机泄露。无论如何,通化“喇叭门”堪称当今考场弊案之登顶之作。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。对付考试作弊,看来需创设一门“反作弊学”了。

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